

# “帝国式生活方式”：布兰德分析生态危机的新视角

何 娟

**摘 要：**基于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刻认知，布兰德提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来揭示霸权性政治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帝国式生活方式”是深深植根于北方国家并迅速扩展至南方国家日常生活实践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帝国式生活方式”揭露了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分析了从根本上克服全球生态危机的障碍和全球区域间生态不平衡的原因。布兰德认为想要真正克服生态危机，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必须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生态转型，走向“团结的生活方式”。作为分析生态危机的视角，“帝国式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关键词：**帝国式生活方式；生态危机；霸权性；民主化；社会生态转型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9)06-0106-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6.010

自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围绕环境议题举办了多次会议并提出了许多设想和政策。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些设想和政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资源匮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环境呈现两种样态——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碧水蓝天，另一方面却是发展中国家中乌烟瘴气。那么，为什么在召开多次全球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全球的生态环境并没有获得实质性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为什么全球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维也纳大学政治系的乌尔里希·布兰德（U. Brand）引入“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的概念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并指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接近于福斯特（J. B. Foster）和克拉克（B. Clark）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但又有一定的差异。布兰德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福斯特和克拉克的思想，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着手，认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可以根植于一种霸权式的生活方式，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公司的战略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与经典意义的帝国主义概念相比，这一概念突出了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本文从布兰德对“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界定着手，分析“帝国式生活方式”对生态危机的阐释，介绍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可能路径，并阐述这一分析视角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一、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意涵

“帝国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殖民征服世界时期，常常与殖民主义、国家的军事行动、暴力征服相联系。但在“帝国式生活方式”中，我们不能从传统意义上理解“帝国式”的含义。布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 2018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发 [2018] 3101）

作者简介：何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维也纳大学政治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兰德借助规制理论来阐述生活方式的概念，并从生态视角描述了何为“帝国式”，介绍了“帝国式生活方式”的产生与发展。

借助于规制理论的发展方式概念，布兰德指出生活方式包含生产和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概念是基于规制理论视阈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概念，此外也受益于发展方式的概念，但是与发展方式不同的是，它赋予微观层面上的日常行为和知识以更重要的地位。”<sup>[1]</sup>其中，生产是为了消费，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与最终的消费需求相符合。消费方式不仅仅指日常生活中个体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还包含了一种动态性的发展方式，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维度。布兰德之所以从生活方式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关系，是因为生活方式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塑造了社会自然关系，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关系的分析必然离不开对生活方式的讨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基于生产和消费规范之间的连贯性，一种霸权性的或者说被广泛接受并得到制度性保障的生活方式能够出现，是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日常实践，并为国家制度所维护，还进一步与特定的进步概念相联结，无论导致这些概念的社会或生态条件如何”<sup>[1]</sup>。也就是说，这种生活方式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且能够得到制度性的保证，那么它也会相应的成为国家统治和管理民众的方式，服务于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社会自然关系。

何为“帝国式”？基于传统的对帝国的理解，可能很难将帝国式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布兰德之所以用“帝国式”，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对别国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的无限占用，并以政治、法律和暴力的形式来确保实现”<sup>[1]</sup>。资本的扩张本性会促使其将触角伸至他国及全球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空间；资本的逐利本性会促使其不断将天然的自然资源转变成获利的商品；同样资本主义的利己本性也会让其转移自己的垃圾，让他国替自己吞下污染。其实这种帝国式不仅体现在北方国家<sup>①</sup>与南方国家之间，还体现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北方发达国家的大量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促使其向南方国家拓展，并且以其独有的方式保证其欲望的满足。一开始“帝国式生活方式”可能会借助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手段向南方国家拓展，但随着它在南方国家的蔓延，其本身成为巩固“帝国式”的手段。当这种生活方式植根于各个社会 and 各个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时，则会形成对自然的霸权，即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因此，这里的“帝国式”可能更接近于霸权性。值得注意的是，布兰德特别关注的是这种帝国主义全球秩序的生态维度，也就是更加关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生态环境破坏成本与收益的不平等分配，所以这里的“帝国式”既体现为全球生态的不平等，也加深了全球生态的不平等，同样也是全球生态不平等的根源。

“帝国式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至少可以追溯至城镇和乡村的对立年代，并且是16世纪殖民主义时代、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1875年至1914年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核心性特征”<sup>[2]</sup>。只是那段时期，“帝国式生活方式”还仅仅局限于北方国家中的上层社会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还是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状态。因此，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普遍化，也没有支配大多数人的生活。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开始普及，跨国生产和跨国消费也非常普遍，这些现象伴随着福特主义的形成。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生产的迅速增长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费，尤其是煤炭、石油的消费，当然还有全球污水池的过度使用，而这些都依赖于全球市场上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和廉价劳动力的获得。此外，随着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发展，资源集中型和排放密集型的消费行为也已经不再局限于北方国家的上层，而是成为大众化的现象。于是，大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曾经的中产阶层和下层人民也加入到了“帝国式生活方式”再生产中，进而巩固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

<sup>①</sup> 本文中提及的北方国家主要指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南方国家则是其他国家。这里的南北主要根据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情况划分。

北方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取而代之的是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破坏性的社会自然关系的盛行。

“帝国式生活方式”对北方国家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不平等地获取生活资料和廉价劳动力，国家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个生活方式。伴随着全球化，“帝国式生活方式”不仅仅存在于北方发达国家中，其触角也延伸到了南方国家中。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墨西哥等，以石油产业带动经济迅速繁荣，“帝国式生活方式”也就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因此，目前“帝国式生活方式”不仅仅存在于北方发达国家中，也存在于部分南方国家中；不仅存在于上层人民，还存在于中产及下层民众中。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获取了大众的喜爱，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巩固自身，使社会稳定和阶层固化，从而使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政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进而造成了对全球社会自然关系的破坏性影响。

布兰德介绍了“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内涵，突出强调了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与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密不可分，那么，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生态危机也与帝国式生活方式紧密相连。想要深入分析生态危机的成因，就需要引入“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

## 二、“帝国式生活方式”对生态危机的阐释

近年来关于生态危机成因的讨论，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加入。布兰德基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引入了“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态危机形成以及深化的原因，了解当下克服生态危机的障碍，揭示全球不同区域生态环境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的动力机制是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布兰德指出，在北方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生态危机就是环境危机，是人类忽视了地球的极限对自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然而，生态危机不可能等同于环境危机，它还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危机。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的霸权性统治的结果，也是社会不平等分配的结果，更是不同权力关系作用下的结果。布兰德提出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类世”和“地球极限”话语所叙述的人类已经或即将要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但更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危机对生态危机造成的影响。布兰德认为，“真正有效的通常是社会—生态不平等现象的政治化，而不是向政策的制定者发出所谓‘星球警告’”<sup>[3]</sup>。这就需要将目光转向布兰德所说的帝国式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内嵌于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并且不断复制，而这种结构则会加剧社会—自然关系的危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突出特征是对全球资源、劳动力、空间和污水池的无限占用，这就凸显了其霸权性。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对地球环境的无限制地使用，体现的是资本对自然的征服和资本对廉价物永无止境的欲望；一方面是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扩张性占用和霸权性“统治”，体现的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和不对等的国际关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布兰德之所以使用“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还在于强调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一定要从社会的各种力量关系及其日常实践入手。人作为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在自身的日常生产和消费生活中，不自觉地巩固了这种生活方式，进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由此可见，生态危机的真正成因是资本主义条件下霸权性的社会自然关系的形成。因而，“帝国式生活方式”不仅是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也是加剧和维持生态危机的原因。

“帝国式生活方式”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布兰德认为“帝国式生活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克服生态危机的障碍，正是“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消除生态危机的进程。在他看来，“‘帝国式生活方式’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之中，它为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提供社会经济福利和地位，并且在所有追求这一目标的人面前呈现为一种承诺”<sup>[3]</sup>。也就是说，“帝国式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国家机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的一种导向，而且已经不知不觉深入他们的各种政策、行为和日常实践中，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和维护霸权性的社会—自然关系。比如就基因资源而言，北方国家“生命科学”领域的公司对南方国家生物资源的占有法律的确认，必须要由国家来保障。在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带来的后果时，需要超越国界的考量与应对，但是更多的国家还是会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在不影响本国利益的前提下参与国际对话和应对生态危机。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时代，应对生态危机的国际性的组织都不是绝对公平的，它们是在霸权性国家的领导下成立的，所以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在应对生态危机时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进而只会进一步维护霸权性的社会—自然关系。

第二，北方国家的“绿化”政策实质上是捍卫“帝国式生活方式”。比如就减排任务而言，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内各国的政府官员总会给各国争取到最低的减排额，波兰环境部就曾经反对过欧盟分担的7%的减排额，认为无法完成，这背后的主导逻辑是分担减排额会限制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减排任务的完成离不开能源的转型，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主要依赖的资源是化石燃料，那么想要实现经济的绿色化就需要将其转化为其他能源，例如生物燃料和风力和电力等等。实质上，“绿化”的政策就是为了维护和延续“帝国式生活方式”，只不过是借助生态现代化的手段实现而已。最终，只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且随着北方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在南方的扩张不断上升。

第三，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北方国家的主流，而且已经渗透到南方国家中，成为南方国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就奢侈品消费而言，根据麦肯锡的报告，2018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2012年至2018年间，中国为全球奢侈品消费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增长<sup>[4]</sup>。奢侈品行业主要分布于欧美，且奢侈品是好生活的代言，所以欧美的奢侈的消费生活成为中国很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定义，进而带来了奢侈品消费的上升，即奢靡的生活方式具有很明显的吸引力。

“帝国式生活方式”造成了南北方差异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造成了全球不同区域之间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布兰德认为“绿色资本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帝国式生活方式”选择性生态现代化的结果，引发全球生态非正义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关键的矛盾在于，‘帝国式生活方式’意味着一部分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过上‘美好生活’，也就是说，它限制或取消了许多人过上‘美好生活’的机会。”<sup>[3]</sup>北方国家的物质繁荣与生态美好都依赖于有利于北方国家的全球资源体系、全球的劳动分工及污水池的使用。“帝国式生活方式”通过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方式获取全球性资源与转移社会环境成本，进而实现“绿色资本主义”的目标。“绿色资本主义”是正在发生的现象，北方国家通过生态现代化的方式走向可持续发展，但是这种可持续发展是以南方国家的资源不断减少和污染加重为代价，并且依赖于从外部获得资源与转移社会环境成本。实质上，“绿色资本主义”理念所展现的是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排斥性的方式来实现区域性和选择性的绿色化。它在通过开发新资源、开辟新的领土、扩展自己的空间来维持自己的资本积累的同时，解决环境破坏的难题。南方国家则成为承担社会环境成本的区域，成为非绿色的区域。比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6%，却制造了全球34%的垃圾。他们将固体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处理、回收、再利用。2018年1月，中国正式实施“洋垃圾”禁令，全面禁止进口4类24种固体废物。此后，欧美国家的垃圾回收商将目光转向其他亚洲市场，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因此，即使我们承认“绿色资本主义”的确产生了，但是必须要意识到这并不代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消除，而是全球不同区域间生态危机的转移。

此外，全球区域间社会生态环境的差异也引发了大量的难民和移民。那些想要离开自己国家的人，正是因为北方国家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摧毁了其生活条件，不愿意接受和忍受这一切，所以

希望通过移民的方式分享北方国家发展的成果。极右翼为了维护北方国家的利益，将这些移民拒斥门外，获得了很多人的青睐。布兰德指出：“威权民粹主义之所以获得如此多的选举支持，就在于它声称不仅能够捍卫中产阶级的、而且还能够捍卫部分工人阶级的（受到威胁的）特权。但是，他们并不是致力于应对（所观察到的）社会衰退的深层根源，而是责怪那些（必须）离开他们祖国的人。”<sup>[5](P3)</sup> 其实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将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矛盾转化为本国居民与外地居民之间空间上的冲突，这样就可以保证自身“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稳定化。由此可见，“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全球生态环境的差异，而且还会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和持久性，进而巩固这种差异性。

“帝国式生活方式”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使全球的生态环境陷入严重的危机，但是它通过其自身的方式使危机在时空上被应对，这成为生态危机一直难以消除的障碍之一。同时，它使得北方国家社会稳定，也以隐蔽的方式支配着南方国家，造成全球生态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生态环境的差异。因此，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必须要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

### 三、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可能路径

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张都进一步深化了“帝国式生活方式”。“帝国式生活方式”植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和政治家的政治政策的制定中，并且有北方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的维护。与此同时，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和社会两极的分化，现实社会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抗运动。想要真正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真正克服其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则必须要实现社会生态转型，进而走向“团结的生活方式”（Solidary Mode of Living）。

社会生态转型是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可能路径。“帝国式生活方式”主要带来了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想要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必然要实现社会生态转型。实现社会生态转型需要考虑转型的逻辑、转型的战略和转型的主体。

布兰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内在的转型逻辑，这种转型逻辑让其不断改变自身，又不断增强自身。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导转型逻辑是什么呢？布兰德指出：“非常可能的是，其主导性的逻辑是创造利润、资本积累和扩张性经济活动。相应地，这就会产生我们已经指出的过度利用人类劳动的问题，而它往往会导致工作的集约化直至职业倦怠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sup>[5](P72)</sup> 因此，这种内嵌的转型带来的并不是美好生活的图景而是环境破坏、气候变化、资源冲突、被迫迁移、威权主义等消极的影响。布兰德所提倡的转型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就是需要摆脱“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操控，摆脱目前社会的各个领域屈从于利润和经济增长原则的状态。这就需要削弱金融市场、资本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并且最终消除它们对社会的结构性统治。

对布兰德而言，“超越资本主义的激进社会生态转型并不是一个政治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批判性和分析性的视点”<sup>[5](P75)</sup>，其可以提供战略的指导。在此，布兰德引入了现存的一些替代性运动，例如能源民主运动挑战了关键性社会基础设施的私有制、“食品主权”的概念呼吁了食品生产方式和条件的社会控制等。他认为这些替代性方案在根本上挑战了社会秩序，可以作为激进社会生态转型的切入点。此外，对于转型战略空间而言，社会生态转型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构思、嵌入和实施，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权力不对称的表现，也是维护“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方式。想要让不同地区的人们摆脱对特定产品需求的依赖和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就需要改变当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那么，有没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来推动社会生态转型呢？布兰德认为，转型的主体和实践者并不是预定的或者天生的，替代性方案的产生是个体和集体通过激进的不同日常实践来实现的，也就是在人

们不自觉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想要将替代性方案转向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不仅仅需要日常生活实践的改变，还需要一种“转型左翼”（Transformative Left）。转型左翼“不仅拥有一个更好的分配概念，而且还能够干预社会生产的形式与实践”<sup>[5](P81)</sup>。转型左翼需要积极加入社会生态转型的进程中，进而找到若干的替代性方案中的关联，引导社会生态转型。由此可见，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社会生态转型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同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整体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

“团结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态转型的美好愿景。想要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就需要改变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使其不再依赖于对自然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相应地，国家之间争夺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也被追求国际团结所取代。那么何为团结呢？传统意义上的团结是要求个体对集体的绝对服从，牺牲个体的权利保证共同体的权利。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认为，在伦理共同体中，团结代表了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在他看来，团结关系指的是主体彼此对等重视、主体间相互肯定他者的能力与特性对共同实践的意义。在现代价值共同体中，“个体不再把他们与社会标准一致而取得的成就和因此而受到的尊重归因于整个集体，相反，他们可能肯定地将它们归因于自己”<sup>[6](P134)</sup>，也就是说个体获得了其他成员承认，形成了自我重视的实践的自我关系。布兰德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他所说的“团结的生活方式”中的团结指的是人们会遵从自己的个性和生活来生产和消费并且创造自己的生活，不再受制于资本的控制，在社会生活中共同形成自身的生活方式。“团结的生活方式”是与“帝国式生活方式”相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公正、自由、民主和真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团结的生活方式”的获得需要民主地塑造社会和社会的自然关系。“这意味着不仅要民主地掌控资源，同时还要民主地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整个过程。”<sup>[5](P102)</sup>这种生活方式不会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来给人们提供美好的生活和福祉，而是会改变对自然征服的欲望，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如何实现“团结的生活方式”呢？布兰德指出：“朝向一个团结的生活方式的社会生态转型倡议，并不是要刻意制定一个宏大规划，而是要承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造自己的替代性方案。”<sup>[5](P102)</sup>这些替代性方案包括来社区花园、汽车共享、再利用和回收计划、争取食品主权、能源民主、生产消费者、百万气候就业运动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做的是从现存的替代性方案中找到它们的共同之处，系统化和强化这些替代性的方案，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且分析它们的优势和劣势。许多替代性方案的共同之处是改变生产和消费的逻辑，“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逻辑其实是资本的积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团结的生活方式”则克服了资本驱动下的再生产的需求，以人们的“真实需要”为目标。民主的方式是实现“团结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方法，人们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进行协商，共同讨论合乎所有人美好生活的福祉又合乎自然更新要求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并根据讨论出的结果生产和消费。布兰德认为我们需要关注拉美地区关于“好生活”的叙事和欧洲影响力不断增加的“去增长”的讨论。“去增长”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福利的增加，并不一定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布兰德看来，“‘去增长’的观点主要阐述的是关爱倡议和社会再生产的团结形式”<sup>[5](P104)</sup>。而对自然、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爱则会让人们摒弃之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人们会逐渐将使用价值和自然的生态化置于日常生活实践的首位。也就是说，现存的很多方案都具有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潜能，关键看其如何将设想转化为现实。

由此可见，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社会生态转型的实现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团结的生活方式”的实现，需要人们从日常生活实践着手，改变之前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进而上升到社会、国家和制度层面。只有真正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走向“团结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

#### 四、“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布兰德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霸权性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关系的批判,“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的引入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着手,揭示了帝国式的隐蔽性,暗含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加剧的原因。它继承和发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帝国式生活方式”特别接近于福斯特、克拉克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福斯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一是一些国家的资源被他国掠夺,并且它们所依赖的整个生态系统发生了转变;二是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与资源的榨取和转移密切相联;三是利用社会的生态脆弱性来强化帝国主义的控制;四是通过倾倒生态垃圾来扩大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鸿沟;五是形成了全球的‘物质变换断裂’,这是资本主义和环境关系的特点,同时也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sup>[7]</sup>这主要是帝国主义行为在生态领域的表现。布兰德则借助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着重分析了这种霸权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再生产和构型。也就是说布兰德的切入点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即生产和消费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受到了普通民众的青睐也受到国家制度的支持,还通过隐蔽的方式蔓延到其他国家,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这就将帝国式的行径变得常规化。同“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相比,“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新在了将生活方式纳入分析框架中,借助霸权理论从微观层面揭示了生态危机难以消除和加剧的原因。因其帝国式行径隐蔽的特点,使其获得了全球多区域上层和中层人民的青睐,从而也加深了对全球资源、劳动力和污水池的依赖。不仅如此,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相比,“帝国式生活方式”并没有直接否定“绿色资本主义”的存在,而是揭露了其具有的排斥性和选择性,有助于人们理解资本主义自身的恢复和调节能力,有助于人们理解目前欧美国家的现实状况。

此外,就理论意义而言,“帝国式生活方式”有助于加深对全球多重危机的认识,进而开拓对生态危机的认知。例如,它将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分析相结合,指出难民和移民的产生也是南方国家的人们不愿意承担北方国家转移的社会环境成本,转而希望分享其果实的表现。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北方国家维持“帝国式生活方式”,企图继续侵占南方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转移污染的表现。这就为西方很多右翼政党并未正视生态危机或者仅仅将其视为自然环境危机找到了答案。社会生态转型作为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方式的提出,丰富了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并且有助于理解西方社会出现的替代性方案。因此,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绿色左翼政治的总体分析框架,是对生态危机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的丰富与发展。

就现实意义而言,全球生态治理应是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民主参与治理的过程。然而目前的全球生态合作共治制度仍存在着缺陷,其突出表现为部分国家在生态治理领域掌握着话语权,另外一些国家则处于边缘位置,无法发挥积极的作用。此外,尽管目前国际社会举办了一系列的会议,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在具体落实上并没有制度来保障。“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分析视角,则提醒我们全球生态治理因为国家之间各自的利益,目前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共治。想要改变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北方国家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南方国家也应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帝国式生活方式”还可以帮助南方国家回应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例如,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对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贡献,但是在国家不断努力改善生态环境的情况下,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铺张浪费的现象。一些消费者仍将西方生活方式视为美好生活象征,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其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要摆脱帝国主义式的依附和控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方式,更是要注重培育绿色生活方式,摆脱资本对于生活的支配性地位,这也是对于消费主义一种有力的回击。想要真正实现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值得注意的是，布兰德在提出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社会生态转型时，并没有自己构建一个宏观的体系，而是认为现存的社会运动和替代性方案可能会促进社会生态转型和“团结的生活方式”的诞生，不过他并没有深入地讨论它们的现实路径和可能性，也没有具体讨论“团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来源以及是否所有的社会运动和替代性方案都可能促进“团结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否需要一个选择的机制等。当谈及转型主体的时候，布兰德提到了转型左翼，但转型左翼如何形成、转型左翼和我们当下讨论的绿色左翼是否有差异、转型左翼如何引导社会生态转型？此外，如何使社会生态转型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方案也仍然是开放性的问题。因此，“帝国式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阐述了其自身在加剧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同时又缓解了部分地区生态危机的矛盾性特征。就规范性分析维度而言，社会生态转型作为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可能路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可能性仍值得进一步探讨，一些核心性的概念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阐明。

#### 参考文献

- [1] [德] 乌尔里希·布兰德, 马尔库斯·威森. 全球环境政治与帝国式生活方式——复合危机中国家—资本关系的表达[J]. 李庆, 邹庆治, 译. 鄱阳湖学刊, 2014(3).
- [2] [德] 乌尔里希·布兰德著, 张沥元译. 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和帝国式生活方式[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
- [3] Brand, U., M. Wissen. What kind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s a major obstacle to sustainability politics[J]. *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2018(3).
- [4] McKinsey & Company. 中国奢侈品报告 2019[EB/OL]. <https://www.mckinsey.com.cn/wp-content/uploads/2019/04/McKinsey-China-Luxury-Report-2019-Chinese.pdf>, 2019-04-26.
- [5] Brand, U., M. Wissen. *The Limits to Capitalist Nature: Theorizing and Overcoming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M].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8.
- [6] [德] 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M]. 胡继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7] Foster, J. B., B. Clark.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curse of capitalism[J]. *Socialist Register*, 2004(1).

##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s a New Perspective of Analyzing Ecological Crisis by Ulrich Brand

HE Juan

**Abstract:** Based o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Brand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hegemonic politics on society and nature.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is a method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hich is rooted in global north and soon expands to global south. A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it reveals the real cause of current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overcome obstacles of the crisis. Furthermore, it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ecological crisis for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rand holds the opinion that we should go from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toward “solidarity mode of living” to overcome ecological crisis and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and finally realize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s a perspective in the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ith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ecological crisis; hegemonic; democratic;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孙洁)